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九十三期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

编者的话：哲人其萎，从风从雨。世存先生此语不单指天象，亦指人心。

厚泽先生的去世激起的涟漪波及海内外，牵动了无数人心。厚泽先生生前低调，身影似有似无，但他的去世却使人感到了巨大的空缺。扼腕之余，他的人格与思想渐次浮现，这才是他留给我们的遗产，并且是更深厚更久远的遗产。这一遗产不仅属于他的亲人和好友，也属于他深爱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也属于整个人类社会。

一如世存先生的意象，他是一粒大地种子。这一种子包含着两个基因，一曰传统人格，一曰现代思想。

对中国的现实，厚泽先生不抱希望，当人们纷纷枉道从势或于无望中寄望于历史的偶然性（明主或时局突变）时，他却不为所动。冷静而清醒地告知世人，没有这个希望。但他并没有因此陷入颓唐或犬儒主义。在这个“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时代，他择善固执。

但希望总是有的。既然人生不过是历史之一瞬，就不能以人生尺度来衡量历史，公理总要战胜，对此，厚泽先生又有着坚定的信念。

这一信念出自道义，也出自理性，出自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

在一次关于“同路人”谈话中，厚泽先生问：“谁是同路人？”一个曾经的党人，这一发问不啻哥白尼式的，一下子把颠倒了多年的方向感颠倒了过来。他说的路，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正路，就是中国的道统与普世价值之路，这才是“人间正道”。

而这一“同路”的过程，则正与厚泽先生的“三宽”有关。在中国，“同路”的过程包括在不知不觉中被诱拐和被绑架的过程。当“争自由”，“争解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之时，这一过程就开始了。自由解放竟成了“打倒”、“冲破”、“砸烂”、造反有理。胡适愤激地谴责这种以争自由为名破坏别人自由的行径，并警告这种倾向最终将造成一个更残忍更不宽容的制度。

这就是厚泽先生所说，从这个门进去，却从那个窗户出来的原因。

厚泽先生的三宽貌似平凡无奇，却是人类自由的命脉之所系。那么，宽容的思想是否容忍不宽容的思想？从厚泽先生提倡三宽，到具体阐释三宽之无底线，这一思想坚硬的原则性露了出来：它所反对的，正是不宽容的思想。

厚泽先生是一粒种子，他将被播种在故乡的山中，在泥土中静静地安歇。但是，是种子就会发芽生长。他的人格将被继承，他的思想将会不断被发掘，被领悟，被发扬光大。

漫忆厚泽 作新斯人 余世存

一

睡得晚，醒得迟，朦胧中感觉手机收了好几个短信。这样一个经过风雨夜的周末，谁会记挂我呢？

睁开眼睛，阳光明媚。仿佛昨日的阴雨不曾有过。

几个朋友转发来短信：“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身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对亲朋好友多年的关心和帮助谨致以衷心感谢！特此泣告。妻熊振群率子女2010年5月9日。”

贵州的杨建国先生称道，“中国伟大的思想者、学者朱厚泽永垂不朽。”

学者张健说：又一棵大树倒了。

跟厚泽先生有一面之缘的闯歌从云南发来短信：“请转达对朱厚泽先生的怀念之情。”

.....

哦，昨天我还在跟少安等人谈起厚泽，我们都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厚泽先生选择了这么一天，母亲节。这个童年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曾撰文怀念抚养他的二姨说：愿她的灵魂得以从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超渡，得到安息。现在他也离开了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得到安息了。

原来昨天的阴霾是为他而来，昨夜的京城大雨是为他而来。

人天眼灭，哲人其萎，从风从雨。

二

四天前，福建的梁丹先生给我短信说：世存兄，厚泽先生危在旦夕！若在京，烦去301代我们见最后一面，痛殇！我回说，我两个多月前去医院看望过他，他要我别再去看他，要我安心读书、思考问题。梁丹回复，那么尊重吧，听说他已不能言语，我会为他祈祷。

昨天下午我去见少安兄的时候，李宇锋先生打电话，说是厚泽先生已在弥留之际，他希望我能给厚泽先生写点文字，长短不论，并问我还有哪些人尤其是年轻朋友可以写字的。在此之前，少安已经拜托过我。我没有犹豫地答应下来。

见到少安兄，提起厚泽先生。少安说，这个当然，心里要有数；只是不必刻意，不必矫情。他的消息比我的多，向来待人和善的他说，国人的无行难以言喻，就在这样的时候，厚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人跑到病房里，要厚泽写字；还有一个人，到病房里支起行头，给厚泽拍照……对少安说的人，我甚至猜到了是什么人。

少安说，人的不懂事是不分年龄的。我想少安的感慨和我的类人孩之断词异曲同工，只是我们都还温良了。国人多无是非，无礼义廉耻。这些平时无行的人，只会见机投机，故到老也不懂事，不明事理是非。

三

两个多月前，忘记了是大年初六初七，我换了几次公交车，进城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厚泽先生。在门口填写访客登记，进入医院大楼，感觉一切都是空荡荡地。离医院一路之隔的东单仍是过节的热闹，我穿行在热闹和寂静里。

进了病房，于浩成、施滨海两位戴着口罩往外走，他们跟我打了招呼就出门了。厚泽先生坐在椅子上，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士正跟他说着什么；他看到我，拍着身边的床板要我坐在床边。我坐上床沿，听女士询问厚泽先生的病情，很快认出原来是胡舒立。

厚泽先生解释了一下病情，我给厚泽先生讲起大理苍山西边的千年的核桃树，厚泽先生笑了，他跟胡舒立解释，说我这两年在大理生活，他曾劝我去看看那些几百年上千年的核桃树。我心里犹豫是否要讲讲我知道的村民靠核桃生存的故事，我更想说一粒种子承载了千年的丰富。但看着老友的病容，我更觉得沉默陪护是最好的方式。

施滨海发短信，说老人要多休息，劝我问候完就走。我坐了一会儿，也就告辞，并说再来看他。厚泽握着我的手说，你不要来了，赶紧做自己的事，读书，好好想问题。

四

我认识厚泽先生不是通过圈子的朋友，而是通过老乡、我的兄长蒋亚平先生介绍的。算起来，有十几年了。亚平跟厚泽早就认识，对厚泽非常尊重，经常请厚泽先生聚一聚。我是在一次聚会时遇到了厚泽，并听他唱过俄罗斯的老歌。

有一年，厚泽先生生日，亚平不在北京，他委托我去给厚泽买一个花篮。我为此第一次去厚泽先生家，在万寿路的高干大院，见到了厚泽先生。他的家算得上朴素，简单，没有多少家具、装饰，但干净，清爽。我们聊了什么，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他给我看过他的摄影，我看着他讲玉龙雪山一类的摄影照片，心不在焉。

又有一次，朋友托我去游说厚泽先生编他的文集。我再去厚泽先生家，那时我跟他已经算是熟朋友了。他的家没有变什么，一切简单，适得其所。一个大的木头架子上层层摆放着新收到的报刊、资料。我知道他仍关心社会，但希望他能同意编集子，尤其是希望他做一个口述自传的东西。他也认为很重要，并举例说项南走了，没留下什么资料，是一个损失。但说到他的自传或口述自传，他就绕开话题，只说自己太忙，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他是忙碌的，他的交游极广。年轻朋友开一个小会请他，他也会到场，更不用说他经常全国各地跑，调研、参观。我就见过当红的人物把厚泽的名字挂在嘴边，也见过有人写文章把自己跟厚泽先生绑定在一起。

有一次我在万寿路等人，遇到一个老人走过，嘴里不时噙动，状若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老人又走过来，有若神经。我一时为老人的孤独伤感，问朋友注意到没有。朋友说，你以为他是谁，曾经红极一时，大名鼎鼎的前中宣部长，左王啊，你看他现在下台后的下场，一糟老头子而已。你看同样为中宣部长，厚泽现在的生活多么充实……

五

但厚泽的悲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单是指他做中宣部长，成为改革中国最先落马的改革派政治家；还有他晚年的忙碌充实，有许多事并非他所愿，并非最为切要，但他不得不去做了，为此耗掉了他的大部分精力。

朋友们谈起朱厚泽，曾说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年龄不上不下。一般而言，人们不在位时比在位时要开明一些，这些开明派多被称为党内的民主派、自由派。事实上，他们退位后的生活是在余热和过日子间摇摆。过日子无多少理想可言，也无什么作为可言，而多跟身体检查的各种指标相关，跟血脂血压、心跳速率、脑部供血、骨质疏松、肝胆阴影……相关。余热则是见马克思之前的作为，是他们曾经风云一生的惯性。因此，他们是孤独的，又是坚持原则的，他们失去了跟社会更多接触的条件，但他们愿意听闻信息，喜欢定期热闹、哪怕是相互取暖。这就给了一些年轻好事之徒或有心人以机会，他们给这些老人提供聚会的机会、信息，请他们表态。因此，开一句善意的玩笑，这些老人即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也会因名因信称义，这名或信就是他们眼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开明、民生，党内民主，等等。他们在群众中赢得了名声，被称为德高望重。好事者以结识他们为荣，以把他们的片言只语捅到媒体上网络上为正事。

厚泽先生的年龄较他们小，被这些资历高辈份高的老人理所当然地看作同类；厚泽先生

有着传统的做人美德，故任劳任怨做一些跑腿的事，而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在心底。在公开场合，他只能发表一些比喻，比如他多次暗示问大家，为什么从门进来的主义，却从窗子里扔出去了。

我在《非常道》里收录了厚泽先生两则故事：

1985年，中共中央调朱厚泽任中宣部长。参加北戴河工作会议时，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清华出身的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胡耀邦点将要朱厚泽发言，朱说，他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朱的发言，反映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

1987年1月28日，邓力群带着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六

作为一个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厚泽先生的晚年是忧郁的、孤独的，尽管他的生活热闹、日程安排得紧张、充实。但他的思考少有外人所知。

李慎之生前对我感慨寂寞，只不过李是外向的，能够天文地理海聊神侃的，厚泽先生却内向，寡言。李慎之说所谓的党内右派不思考，厚泽先生比慎之先生走得更远，他在心智、精神、灵魂、头脑上超出党内右派们远甚。我想这一定有出身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的原因，李慎之有贵族气，书生气，厚泽先生却来自贵州，一直跟平民大众的心相通。

人们可以从厚泽先生的一生中总结出他的诸多特点。比如他的亲民，当他被北京召进高升，他的贵州省委书记之职由胡锦涛先生担任，他带着胡下乡。朱厚泽说：“锦涛同志来了，我也不办什么移交了，咱们一道下去看看，比坐在上头办公室里介绍情况强。”比如他的治国心思，他在中宣部长之任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理念。比如他的治道，退休后，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常人政治”思想，给当局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是一个能上能下的政治家，他懂得时，也懂得位。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做成他的营养，他在贵州工作时的见地即不同凡响，贵州的生活和工作给了他梯级、平台、台阶的意识，他一生就是不断地梯级上升。但他一生从未等待过，用他在贵州主政时多次阐述的观点：按照梯度开发理论，如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似乎只有等待东部、中部都发展上去了，才有你的份。人不必幻想或等待明天更好的生活，因为人可以让自己当下的生活好起来。因此他能以自由看待发展，能质疑一般人眼中的统一、文明，能思考进步和天人关系，能理解阳光政治和中国模式……

他的时运不济，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但他从不抱怨，只是专心于自己的思考。有些书生气重的策士曾给他建言，说他做过地方诸侯，资源广众，该如何如何，他苦笑。何家栋先生生前感慨厚泽至清，说求他安排个人，他都摇头。

我当时也以为是他廉洁，后来发现这是厚泽一类有着圣贤心理的中国人的必然命运，他一旦不在其位，他的资源相当于零；我后来发现，厚泽先生是深知此中三味的，他明白自己能够施展的空间有多大。一个不在其位的贪官污吏都是人人可欺的癞皮狗，一个不在其时的企业家会抱着金银财宝饿死，一个不在其时位的地方大员则跟我们这些文人差不多，只不过厚泽先生不想做文人。我一度称其为独行侠，后来发现他跟我一样只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七

厚泽先生的自由境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般人以为他是改革派，良心派，党内自由派，

党内难得的好人……这都是当代汉语的窘境的表现。实际上，在我理解，厚泽早就在内心跟他的党告别了。君子群而不党，厚泽先生合群，但他绝不会党。他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公开退党而已。我看过他的散文，那样的人间情怀不是一个“松树的风格”、“敬畏人民”一类的共产党人写得出来的。他早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只不过他以自己的心力向中国人攀升，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也确实越过普通的中国人民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被误解，被打压，被监视，被封杀……

厚泽先生是一个爱思考的人。这样说，我总是忽视了他的行动能力，实际上，只要给他平台、机会，他的能力是超强的。我看过他在贵州任上给北京写的千字报告，那样的文字是我们这些书生写不出来的。

我国民一生大概只有五年左右的时间光华灿烂，其他时间，不过是庸人和看客，等而下之，不过是糜费民脂民膏的寄生虫，不过是祥林嫂一样的活物，不过是类人孩而已。“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很多人没有善用这宝贵的三年五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正在其时。项南在福建任上，只有三年左右的实践机会；厚泽在中宣部长任上，更只有一年的施展机会，但他们都善用了这一年、三年，因此他们为人记忆，他们不一定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但他们给世道人心以安慰。

一个民族跟一个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厚泽先生深知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无物之阵是如何遮蔽了我们个体的心灵，他也深知时代给予一代又一代人幻象的骚扰。每个人不从根本上着手，就没有希望。

厚泽语重心长：“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

八

我曾经应朋友之约约为厚泽先生的一次演讲写编者按语——

本期编发了朱厚泽先生的一次演讲摘要。朱厚泽先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有悲剧色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执掌中共中央宣传部期间的“三宽”政策几乎跟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策略相当，他的命运显然不如戈氏幸运；在他和他的同志手中，已经无能清算埋葬专制中国的当代形式……

但是，朱厚泽先生的言路思路走得远比他的共产党同志远得多。在共产党的等级专制和普遍专制体系内，在由其名位、利禄、形象、思想、权威、德高望重和羽毛等组成的差序格局里，朱厚泽先生显然背离了一个党人的本质，他回向并认同到文明史以来的精神进化的前沿，尤其是他的晚年更是“海阔天空凭自飞”：他的生存的全部落脚点在于人的良知正义。因此，他远比陈云、利加乔夫、久加诺夫这些自以为是（纯正）的共产党人要平实得多，甚至比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明达正直的共产党人要超越得多，他属于历史和人民大众。

了解中国当代史的学者承认，一个顾准足以挽回极权时代的中国思想的荣誉，一个李慎之足以安慰后极权时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后人将会承认，一个朱厚泽足以救赎以理想自任的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朱厚泽去职之后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是陈独秀先生晚年思考的当代延续；只不过，朱厚泽先生思考的背景比陈独秀先生当年的更要复杂更要困难。朱厚泽先生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在深度广度上早已超越了陈独秀先生晚年对民主问题的著名反思，这一点，了解朱先生近年言行的朋友，自有会心。

尽管今天的中共官员们大多嘲笑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幼稚和亡党亡国行径，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朱厚泽先生悲悯地理解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专制人格。朱厚泽先生，跟千千万万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一起，跟中国人民一起，在努力探索中国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路径、方法和目的。一个饱经罪苦的东方大国，将会在这种努力下成功地纳入文明世界，能够良性自处并学会跟世界其他民族共处。

——现在看来，我当时行文还是太激烈了一些。我们太容易走向是非主义，太容易为是非争辩，而忘记了人的有限性，忘记了有限生命中无限的仁爱。我们又太容易飞龙在天时得意忘形而不干正事，或者我们以为形格势禁，守位守时以投机要紧。这正是无数同胞身为中国人民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得意的原因，也是无数同胞身处强势而无作为的原因。从三公之贵和中国人民之贱中新生的厚泽先生一如他的名字，宅心仁厚，泽惠万方。

九

厚泽先生是我知道的中共党内高层最早用电脑的人之一，他比我用得还要早。我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那时就听说厚泽先生一天有好几小时泡在网上。他的知识、信息一点儿也不陈旧。我曾称道说，近代以来，只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的发展演进跟世界知识同步；而当代的落伍几乎无人关注。这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精神和知识的世界同步性，厚泽先生就是这少数人之一。他真的是像海绵一样吸取并站在人类思想的高端。

我批评贾府的焦大，当代社会的二丑，痛陈时代进入了一个次法西斯时代，……这些文字厚泽在网上都看到了，他见了竖我起大拇指，并几次不厌其烦地把电子邮件告诉我，要我新作给他看。我明白他早已不是贾府的一员了。

我曾经幻想跟厚泽先生交流得深入一些。他被人称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曾问他是否听到此传闻，他说有此一说。但说得深层问题，其实是没有的，现实问题都在那里摆着，有什么深一些浅一些呢，他提常人政治、阳光政治其实就有此意思。大有深意其实平常。次法西斯时代，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只是在平常运转而已，如何调整方向，政治家企业家思想家们不需要有多么深刻伟大，不需要阴谋晦涩，只要尊重常识，尊重常人而已。

前年秋，我到福建连城，遇到参加项南纪念会的厚泽先生，他见到我，非常开心。他还是关心国是，只不过他的视野更开阔了，他问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危机是否会带来社会思潮的左倾，我以历史不走回头路走了也是闹剧的话来宽慰他。他问起我做什么，我说兴趣转到中国古典中去了，他点点头。我问他做地方大员时，统治的特务手段是否渗透到乡村，是否每个乡村都有了线人；他说不是，那时的干群关系还是不错的。说起大理，他要我有机会到苍山西边的村里去看看，那里有几百年的核桃树，有意思得很。我以为他是想知道那里的村民如何了，我后来去村里小住，一再看着那些核桃树，想起厚泽先生，突然想到这百年千年的老树给予厚泽的意象远非民生那么简单。穆旦的诗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不禁伤感我们中国人多终其一生只能做一颗颗种子而已，无能开结出这穿透时空的花实色相。

我们和耶苏一样，给我们你给他的欢乐，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
在非我之中扩大我自己，
让我们体验我们朝你的飞扬，在不断连续的事物里，
让我们违反自己，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

主呵，我们这样的欢乐失散到哪里去了

因为我们生活着却没有中心
我们有很多中心
我们的很多中心不断地冲突，
或者我们放弃
生活变为争取生活，我们一生永远在准备而没有生活，

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

主呵，我们衷心的痛惜失散到哪里去了

每日每夜，我们计算增加一点钱财，
每日每夜，我们度量这人或那人对我们的态度，
每日每夜，我们创造社会给我们划定的一些前途，

主呵，我们生来的自由失散到哪里去了

十

我回到大理的时候，跟厚泽先生通邮。他很快给我发来他的照片，我称道他的“玉照”照得好，把一个忧患的仁者志者形象照出来了。到大年三十，我写下四十生日自寿诗，呈厚泽先生，他回复说：我元月住院作口腔手术，已于前日回家，没大问题，愿你好好宁静下来，观察思考，未来需要办的事还多啦。保重保重。

到三月份，我住进巍宝山长春洞。在道观里无事，上网看到“老头会”的老人们挺胡，说是要站在一起，看到厚泽先生的名字，很是诧异，很快又看到文章说这是某人代厚泽先生强签的名字。想到厚泽先生寄赠我的照片，就口占了几章打油诗，名为“题赠朱厚泽先生”，给厚泽先生发过去。

一

革命家风多威权，圣徒心地遵至善
戈巴契夫中国命，百年称道在三宽

二

门窗路径已惘然，懒与宵小讨立宪
别有衷心谢时望，签名上奏是乡愿

三

东土变易虽枉然，一息尚在求善缘
论世忘却三公贵，风雷悲悯少年看

四

地仰天俯真信然，蝴蝶飓风也相关
民我同胞物我与，无声无臭厚则宽

很快收到厚泽先生的回复：“世存老弟:谢谢你的来信和题诗.传上京郊照片一张.略表心意吧.如有空,请将电话相告.祝好.朱老头 20090315 0:05”“朱老头”传给我的照片居然是我的一张照片，几年前我们在郊区玩儿，他偷拍了我，我都不知道。事隔多年，他居然随手能找到我的照片寄给我。这是我这样的书生做不来的。他要我告诉电话的事我忘得干干净净，这次写怀念厚泽先生的文章，才想起此事。他太寂寞了，一定有话要跟我说，只是我远在天边，尚未能让自己适得其所。

但我相信厚泽先生能够理解，正如我能感受到他纯良的心地。我们努力了，这就够了。无论我们作为一颗种子是否开花结实，我们不曾受时世的污染，这就够了。

网上流传现场的朋友短信说：朱厚泽先生辞世的那一刻，雷声大作，风雨交加，医院的院坝里，一地白花！若不是亲眼见到，真难以置信。

我因种子意象想到厚泽先生，不禁想起唐人在他们天才的诗人李商隐辞世时写的挽诗：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
良马足因无主蹶，旧交心为绝弦哀。
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

但网友的短信让我明认，厚泽先生作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希有的圣贤和大地种子不必抱憾，我们也不必抱憾。他做了他该做的，他不得他该要的。天地也因此为他送行，在母亲节这一天让他回到永久的故乡。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解脱者，罗汉，真正的无位真人，一个足以风行百代的中国人。

十一

王安石辞世时，他的不可戴天的政敌司马光主张“尚宜优加厚礼”，因此哲宗皇帝对王安石追赠太傅称号。他的另一敌人苏轼时任中书舍人，负责为皇帝起草诰命。苏东坡跟司马光一样超越了政见，站在更高的层次，为王安石盖棺定论。苏东坡写道：“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苏东坡向自己的敌人致敬，因为他们共和才有生命，才有美。

这位不世出的宋代才子为皇帝代笔，为他时代的圣贤和大地种子送行，因为他看出了种子的示范效应：“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如果我们公正地看厚泽先生，他也正是我们时代“作新斯人”的典范！

2010年5月9日写于北京

厚泽先生魂归何处？ 窦海军

2010年5月9日0时16分，朱厚泽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从此，一个仁德智慧的长者与我们永别了。

从切除口腔溃疡的一个小手术到撒手人寰，从一个健康的老人到一捧骨灰，厚泽先生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亲友们是一路陪伴他走过去的，但是这些活着的人还是不免因为这样的速度、这样的骤变，而感惊愕，而扼腕顿足。如果有神，神为什么这样快、这样早地招他而去呢？难道神丝毫不顾及厚泽老的意愿？难道神不爱这个世界吗？厚泽先生是多么地热爱这个世界啊！这个浑噩的世界又是多么地需要他的存在、他的思想啊！

曾经的黔贵学生娃，曾经的理想热血青年，曾经的高官大吏，曾经的虎狼异己，厚泽更是宽厚、智慧、博爱之君子。生于腥风血雨的时代，污泥瘴气中滚打一生，最终化为埃尘不染、冰清玉洁之美莲。厚泽令多少新管老吏黯然，也被多少从善者奉为楷模。他不谄不屈、不嚣不狂，愈老愈显其理性智慧的光芒和真情妙趣的魅力。他早早明辨了红太阳照耀下红河

不是美丽的反光，而是一条源远流长、愈加腥浓的血流之河。他主张人本的民本、尊重人道的人权、崇尚宽容的自由。

厚泽的思想充满魅力。比如他在解释恩格斯关于“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时，特别强调人类毕竟还是在崇奉真善美。否则，人类世界是不堪设想的，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他说，人类在维护和追崇真善美过程中，科学和信仰都是不可或缺的。科学是人们对于真理的探索 and 追求，信仰则是人们对善的一种寄托，但是我们的政策往往颠倒了二者的关系，要求人们对科学（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加以信仰，而对信仰（如宗教信仰）又要求其科学。这样，既堵塞了人们对真理探索的道路，也堵塞了人们对善寄托的道路。

像这样的思辨和言论，在厚泽先生的晚年生活中俯拾即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蕴藏了丰富思想宝藏的人，却至死只有一本公开出版的个人专著——不是文字，只是一本摄影作品集。这是人类当今的苏格拉底现象——还不如苏格拉底，厚泽连一本旁人记载的思想语录都没留下。

厚泽先生是一个伟大承诺的历史追随者，也是承诺者原形毕露的现实觉醒者，还始终是一位良心厚重的忧国忧民者。更加令人敬仰的是，他又是一个理性睿智、深邃博大的思想者。对于没落的制度和势力来说，最可怕的不是哀怨，不是咒骂，甚至不是刀枪，而是洞彻本质的思想。前两年的一天，厚泽先生微笑着对上门来警劝他的人说：你们可以不让我不让我那样，但是不能不让我思想吧？“从追求民主自由的门进来，却从文化大革命的窗子里跳出去。”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不会停止的，讨论也是不会停止，这个是要讲清楚的。

1980年代，时任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倡导“三宽”——宽松、宽容、宽厚，这令善于念紧箍咒的唐僧们怒不可遏，也令厚泽先生落荒于现实，屹立于历史。

厚泽先生还是一个很诗性的人。他一生热爱文艺、体育。他歌唱得好听，网球打得不错，照片拍了很多，电脑玩得挺棒。前年8月，厚泽与朋友一行到烟台，昆崙山中的小路上，大家席石阶而坐，鼓动他放歌一首。老先生一首贵州民歌后，又鼓动每个人都要唱一首。歌声、掌声、笑声穿丛林，撩小溪，抚苍岩。回到住处，同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朱老半是自言自语的一席话又是令人回味无穷——阵势挺大，花钱不少，每个表演者都只是一个机械的符号，集体围着一个指挥棒转，缺少个体个性魅力的展现……

当今，年近八旬并不算很老。厚泽先生步履清晰、思维敏捷、趣味横生，他尤其不老。2月12号到医院去看他时，他还春风满面地说：“来，我穿着病号服咱们合个影。”之后放疗开始，身体便每况愈下。4月24号那次去探望，他已经言语乏力了。沉默了十多分钟，像是在积攒力气，然后他让女儿把床摇起。先是说：“从一个小小的口腔溃疡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一步步搞成这个样子，看来当时是估计不足的。”又说，“现在的感觉很不好，感觉是在生命极限的边缘左右徘徊。”

是啊，这是朱老始料未及的，也是亲朋们难以接受的。跟随着灵车驶向火化厂，现实恍惚，神志迷离，犹如梦境。看着朱老的木棺缓缓地移向炉膛，我想象着灵魂是不死的，这只不过是一个高贵的灵魂与承载它几十年的躯体的别离。

那么朱老的灵魂又将到哪里去呢？我们不想让他像佛陀说的那样到地狱中继续拯救罪恶，那样太受罪，太劳累；然而他也不会去天堂享福的，他一定还会在人间——与我们在一起，与卑微的百姓们在一起。他不会离弃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他抛不下这依然瘴气迷蒙的祖国。

2010年5月9日

想厚泽 袁正光

厚泽在病危之中。我们又不能到病房去看他。我只能想。

无论是早期的英国、法国，还是近期的东欧、苏联，一个民族要发生一次飞跃，发生一次伟大的转变，事先都得有一波思想启蒙运动，而思想启蒙能否发生、发生的深度和广度，则取决于这个国家政治上对思想的控制状况。我们中华民族的历朝历代，在控制思想方面，应该说不落后于任何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而近几十年来，可以说集几千年思想控制之大成，下有政党建在连队、街道和乡村，上有专门控制思想的部门。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思想控制部”。这个部门的功能越强大，这个民族智慧就越萎缩，这个部门的工作成绩越大，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就越差。现在，正是这个部门功能最强大的时候，也正是这个部门最有成效的时候。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在上世纪 80 年代，竟然就是在这个部门，出现了一个提倡“三宽”的部长，“宽容、宽松、宽厚”，联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举打破思想禁锢的枷锁。带来了整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几千年来，几百年来，几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何曾遇到过这样的“三宽”时代！在这样的部门何曾出现过这样的部长？“三宽”不仅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时间很短，但却光芒四射，影响深远。

后来，这位部长成为我的良师益友，这是我一生的荣幸。他就是思想界、文化界熟悉的朱厚泽先生。在水车屋的日子里，有已经过世的李慎之老师、李宝恒老师，还有健在的其他老师和朋友们，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探索未来的道路，无话不谈，无拘无束。我曾经问过厚泽：“贵州怎么会出个朱厚泽呢？”（厚泽出生贵州，又长期在贵州工作，从贵州省委书记到中宣部部长）他告诉我们，青年时代，正好西南联大在贵阳办了一所“清华园中学”，他考清华园中学的时候，一位长着满脸络腮胡的教授面试他。这位教授一见面就问他：“你为什么长那么胖？”他想，你不是面试吗？怎么问这个？但是他却随口反问道：“那你为什么长满脸的络腮胡？”教授立刻说：“OK，你被录取了！”这叫机智，这叫自信。我们知道，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大学，还培养过诺贝尔奖获得者，那就只有一所：西南联大！没有想到西南联大的中学，还培养出一位朱厚泽。

西南联大的文化，实际上是人类新文化在中国的闪现，一闪而过，却深深地划上一道印迹。人类新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权文化，以人为本的文化，即“人本位”的文化。“人本位”是针对“君本位”、“权本位”、“官本位”而言的。科学为人权提供了思维和理论的武器，人权反过来又成为科学与民主的基石。从“三宽”到人权，本来是当时最好的发展取向。厚泽勇敢地开了头，可惜，很快被打断，又回到原点。回到原点的“改革”，形进实退！当有领导提出权为民所用的时候，厚泽一针见血地提出“权为民所授”。一字之差，实际上是两种文化、两种价值观的巨大差别。走向民主，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而人权则是民主的基石。我相信，厚泽的愿望，我们共同的追求，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记得在厚泽第二次住院前，我们相聚的时候，厚泽一直还担心所谓“中国模式”给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来，没有理论的国度，是创造不出模式的。即使是“模式”，那也是坏模式。厚泽担心的，恰恰就是这种坏模式，虽然称不上模式，但让人麻痹，如同温水中的青蛙那样，舒舒服服地走向灾难。当感到危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厚泽始终在关注民族的未来。

2010 年 5 月 8 日

厚泽同志的思想魅力将与现代文明共存 蔡德诚

厚泽同志在党中央宣传部长任上，对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工作明确提出的“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将在党的历史上，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一切过往的历史证明，一切现实的文化、文明的困顿、困惑仍在继续证明：一切善良的人们精神自主，人格独立的尊严，是不能侵犯的；一切良知知识分子的自由思考，自由探索的政治文化权利是不能剥夺的。否则，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然会由此要趋向、要陷入专制、专权、专横的历史泥潭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公众若因此不能自由地疏理，自由地总结自己过去的历史教训；不能自由地探讨、纠正当下面临的种种社会困顿、难题；不能自由理性地探索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道路，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因此，当下在文化、思想领域中浮现的种种浮华、低俗、肤浅和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也都将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大浪淘沙。

我深信，厚泽同志当年倡导的“三宽”政策，终将在中国文化文明未来中兴的发展进程中，再显它的魅力和光辉！

安息吧，厚泽同志！

作为与您相交相识廿多年的知心朋友，您的人格魅力，思想魅力，将永存于我们心中。

2010年5月9日

“三宽”是篇大文章

——怀念朱厚泽先生 张显扬

厚泽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中，最可宝贵、最有影响、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宽厚”、“宽容”、“宽松”六个大字。无论海内外，人们说到他，都离不开“三宽”这个主题，称他为“三宽部长”。“三宽”是厚泽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创造之一，是他作为开放型政治家的一个符号。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别的都淡忘了，“三宽”不会忘。他的英名，将和“三宽”一起，镌刻在中国转型时期的历史上，为人们所铭记。

“三宽”踩了老左们的“痛脚”

“三宽”属于现代政治文化的范畴，它彰显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它以朴实的语言，和“权为民所授”五个大字相伴，表达了宪政民主的基本精神。它的对立面，就是至今仍横行无忌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表现在方针政策上，就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厚泽先生提出“三宽”，就是冲着它们去的。

他第一次讲这个问题，是1986年3月8日。第二天又讲一次，接着又讲第三次。一次比一次讲得多，一次比一次讲得宽。那时，中央正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准备提交这年秋天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决定”，反“自由化”和反反“自由化”，进行着激烈的较量。邓力群之流上窜下跳，极力反对胡耀邦比较开明的指导思想，要把中央的

方针往左拉。厚泽先生关于“三宽”的讲话，是反反“自由化”方面击出的一记重拳。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万里对此极表赞赏，书记处开会，他指着邓力群的鼻子说，“你就说不出这些话来。”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人，也对厚泽先生表示支持。

邓力群自然不甘落寞。他去安徽视察工作，在那里大批“三宽”。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三宽”，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三宽不是中央的意思”。这是他惯用的手法：凡是他不赞成的别人的东西，就说这“不是中央的意思”。他没有问问自己，他有什么资格随便宣判，这是不是“中央的意思”，中央授予他这样的权力了吗？令人愤慨的是，老左的僭越行为，从来不受惩罚。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生态，否则左毒何至于流布不止？

斗争非常复杂。这从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他去上海视察，讲了一篇文章，讲得很宽很好，科技、经济、教育都讲到了。讲话精神，和厚泽先生讲的都一致。或许是为了回答上海方面的质疑，他特别讲了这么两句话：“厚泽同志出来讲的那些话（关于“宽松”问题），是跟中央报告了的，讲的是好的。”其实，厚泽先生没有报告过。他这样说，是为了支持厚泽先生。但是，他接着又说：“至于用词嘛，‘宽松’这个词可以斟酌。”他讲话里原来有“宽松”、“和谐”的提法，正式发表时改成“团结”、“和谐”，把“宽松”给“和谐”掉了。这显然是一种让步，一种妥协。个中原因，恐怕是受到某种压力。过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某常委（极可能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乔石）打电话给厚泽先生：“厚泽，你那个‘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这就不只是让步、妥协的问题，而是鸣金收兵，全线撤退了。随着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反自由化，至少要讲20年”的蛮横表态，“三宽”这篇文章，重重地划上了句号。厚泽先生不久即被调离中宣部。

“为什么用什么词的问题会闹的这么厉害？”厚泽先生说，“因为‘宽松’这个词，实际上跟那些人要拧紧螺丝钉、要整自由化顶着的，他们觉得这个话是踩了他们的痛脚，不然就这两个字费那么大劲干什么？”一点不错。踩了人家的痛脚，还能不跳吗？

“三宽”“三紧”，冰火两重天

最初，厚泽先生讲的是“宽松”、“和谐”，并没有把三个“宽”连在一起。后来为什么连在一起了呢？“就因为我已痛感到这个闹腾的用心。我讲宽松、和谐有人就受不了了，就要开展批判，再加上启立的让步，还要改词换句，似乎原来的词有什么不妥”。“后来我看形势越来越不行，干脆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就把三个宽一起抛出来。”这就是厚泽先生！他外柔内刚，你批你的，我讲我的。他先讲了一篇富有哲学意味的开场白：

“今年（1986）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这个开场白，语多曲折，暗藏玄机，但意思非常清楚：尽管道路曲折，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他信心十足。接着，便直奔主题：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和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很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

会从各个方面来。保持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就是“三宽”的由来及其含义。厚泽先生态度平和，取的是规劝的态度，用的是商量的口吻，但话锋所向，每一条都和老左们针锋相对。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比就知道，“三宽”和老左们历来的方针，冰火两重天。“三宽”主张对不同思想观点“宽容”，对不同意见者“宽厚”，整个社会氛围要“宽松”。讲话中也就马克思主义提出问题：“在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以后，如何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的成果”。这实际上是对僵硬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质疑。特别是最后一段话，大大拓展了“三宽”的意义，不光讲思想文化问题，而且涉及经济、政治、国家民族的大政方针。话虽不多，意义重大。

必须承认，邓力群的行为虽然违纪，他的嗅觉是敏锐的。“三宽”确实不是“以邓小平为核心”（那时还没有“核心”的封号）的“中央的意思”，充其量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民主一改革派的“意思”。“中央的意思”是什么呢？“三紧”：“紧盯”、“紧查”、“紧压”。对不同意见者紧盯，不许乱说乱动；对不同思想观点紧查，不许传播扩散；对社会上任何可能的自由民主气息紧压，不许抬头蔓延。他们当然不会愚蠢到公开提出这样的口号，但实际上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从“‘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到“舆论一律”和“香花、毒草”；再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再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都是赤裸裸的“三紧”吗？

人们在对比中领略了“三宽”的意义，感到欢欣鼓舞。特别是我们这些被紧盯的人，更感到丝丝暖意。一时间，厚泽先生声名大震，而“三紧”的前台人物邓力群则更加不得人心，他的“左王”的恶名更加昭彰。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得的经历。那时候我们着实轻松了一把。可惜好景不长。到1987年春天，随着胡耀邦下台，我们又成了“三紧”的对象，直到今天。

“三宽”的文章要继续做下去

“三宽”是一篇大文章，不幸中途划了句号。从那时至今，时间过去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三紧”依旧，并且变本加厉。人们呼唤“三宽”，是很自然的。这篇文章需要继续做下去，而且必须深入一步，有所发挥，有所前进。

厚泽先生讲“三宽”的时候，民主、自由、人权，特别是自由和人权，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都在批判之列。他讲“三宽”，就是要打破这个禁区，为人们争取这些做人的权利。众所周知，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其中包括政党这样的政治组织的成员，都应该有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不管这些思想观点和权威方面、和“组织上”是否一致，甚至直接相左，都不应被禁止，不应被封杀。不同意见者不应被追查，更不应被剥夺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这既是人权，也是公民权。整个社会的空气、环境应该是宽松的，不应该搞得阴森恐怖，剥夺人们“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因为人们从中领悟了这些宝贵的价值，才那样热烈地欢迎“三宽”。

但是，在充分认识“三宽”的价值的时候，必须清醒地看到，真正要获得民主、自由、人权，靠向当权者呼吁、规劝、打招呼，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厚泽先生非常清楚。可是，他身为中宣部长，只能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政见，这无异于在狭缝中呼喊。这种情况，和身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几乎完全一样。难能可贵的是，他凭借坚定不移的宪政民主精神和智慧的头脑，还是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敢于这样做的，能有几人？当然，现在回头去来，无论他说话的角度，还是抨击的力度，都明显地带

有那个特定岁月的印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方打招呼，要改变一点方针，不要箍得那么紧，要让人家自由一点儿。”

厚泽先生是一位不断进取的思想家。被迫赋闲以后，他对社会政治问题和思想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许多高见。例如，近年来，他提出“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就是一项带纲领性的思想理论成果。“三个反对、三个主张”，说到了问题的根子上，深刻地揭示了“三宽”、“三紧”的制度背景。这是他思想上政治上的重大转变。正如他自己所说，“反垄断完全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场上”。

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是“三紧”的根源。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多元文化，是“三宽”的基础。只有建立起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多元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三宽”所呼吁的民主、自由、人权，才能得以真实现，“三紧”的祸害才能真正得以根除。而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只能靠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们，不懈地进行斗争。“三宽”这篇文章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做下去。如果说它的上篇是表达理念、提出方针的话，那么它的下篇，应该是起而行动，为它的实现建立制度保障。就目前情况而言，护宪和维权，有着极大的紧迫性，应该成为实践上一个重要的目标指向，成为“三宽”下篇的简明扼要的导言。如果能在这个方向上把“三宽”的文章做下去，我相信，厚泽先生的在天之灵，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2010年5月14日